

历史研究

·下册·

(英)湯因比著

曹未风等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研究

· 下 册 ·

(英)湯 因 比 著

譯 者

曹未风 周煦良

耿淡如 章克生

张师竹 徐孝通

刘玉麟 林同济

丁彦博 王造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1957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
D. C. 索麦维尔的7—10卷节录本译出

历史研究

·下 册·

(英) 汤因比 著

译者

曹未风 周煦良

耿淡如 章克生

张师竹 徐孝通

刘玉麟 林同济

丁彦博 王造时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16 1/2 字数361,000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统一书号：11074·343 定价：(十三) 2.75元

内部发行

对湯因比著“历史研究”7—10卷的批判

(代序)

曹未风

—

湯因比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原著7—10卷出版于1954年,距离1—3卷出版时间(1934年)二十年,距离4—6卷出版时间(1939年)十五年。在这期间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湯因比的“历史研究”原著正文部分共十卷。其后又出版了11卷,是一册地图;12卷(出版于1961年)是一卷总答辯。第十二卷在“历史研究”的总书名下有一个副标题,是“重新考虑”(Reconsiderations)。至此湯因比的“历史研究”共十二卷便出齐了。前后相距二十七年。

1947年英国人索麦维尔(D. C. Somervell)为他的前六卷原著做了一个节本,畅销一时,对于传播他的这部著作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后四卷的节本。我的这个译本共分上、中、下三册:上册是原著1—3卷节本的译本,中册是4—6卷节本的译本,下册是7—10卷节本的译本。至此已将他的十卷节本的全部介绍过来了。通过这个节本的译本,读者已可以看到湯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基本面貌。索麦维尔的节本乃是在湯因比本人的合作与帮助之下进行的,且曾得到了他的很高的评价,认

为可以完全体现原书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原著第十一卷是一册繪制得比較粗糙的地图，讀者有兴趣可以翻閱原书，不預备翻譯了。至于第十二卷那个总答辯是湯因比对于在二十七年間对他进行过批評的評論家們的总答复，现在尚无节本，估計也可能沒有节本。这本书对于了解湯因比的当前观点，尤其是对于当代西方資產階級历史学界的动态的了解可能有帮助。此书的翻譯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我的譯本的上、中两册前面我都曾写过一篇代序，一方面对节本的内容做个扼要的介紹，一方面也对湯因比的历史学說进行一些必要的批判。现在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与認識他的7—10卷的节本的主要内容，再写一篇代序。这里主要是介紹这四卷的内容，同时結合这四卷的主要内容对湯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全十卷，作一初步的总的批判。

二

根据湯因比的最初草拟的写作計劃，全书共分十三个部分：

1. 序論
2. 文明的起源
3. 文明的生长
4. 文明的衰落
5. 文明的解体
6. 統一国家
7. 統一教会
8. 英雄时代
9. 文明在空間的接触

10. 文明在時間上的接触
11. 文明历史的节奏
12. 西方文明的前景
13. 历史学家的灵感

根据湯因比自己的說法，这十三个标题是他在1921年的一次旅行中在火車上写下来的。到1954年全书写成时，他只更动了两个标题。一个是第十一部分的标题，他把“文明历史的节奏”改写成为“历史中的法则和自由”，一个是第十三部分的标题，他把它改为简单的“結論”两个字。而从其内容看来，他的主要思想意图则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湯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十卷正文部分可以按前六卷和后四卷分为两大段。前六卷写到“文明的解体”为止，共五个部分，后四卷从“統一国家”起到“結論”为止，共八个部分。在这两大段之間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前六卷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后四卷完成于大战以后。二是前六卷罗列的历史材料多些，是他的著作的論据部分(虽然也有論点)，后四卷發揮的議論多些，是他的論点的主要部分。三是他的思想方法与立场观点在前六卷中还比較隱蔽，多是通过历史材料間接地表现出来(虽然也有个别的比較暴露的部分)，而在后四卷中他的真正意图与阶级本质却更直接地毫不隱蔽地暴露出来了，有时候甚至还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因此为了很好地認識与了解湯因比这位“历史学者”的真正面貌，后四卷是更重要的。

根据湯因比对于人类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他在前六卷中曾經取得了这样一些“結論”：

- 一、研究人类历史的对象乃是“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范围”，

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文明；

二、在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的六千年中，共出现过二十一个文明，在这些文明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空間或時間上的关系，或“亲子关系”；

三、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史，都各自經歷其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四个阶段；

四、在起源、生长与衰落三个阶段中，每一个文明都是“自給自足”的，只有到了“解体”阶段中，一个文明才变成了不“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单位，必須到一个文明的范围之外去找原因；

五、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时候，在二十一个文明中有二十个已經解体或正在解体，只剩下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还保有着生命的活力。它是不是也要解体呢？湯因比的答案是如果搞得不好，它可以避免遭受解体的命运；

六、人类历史的希望与命运将全部寄托在高级宗教的身上。他說现在世界上共有四个高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与佛教。他說宗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是一种“新品种的社会”。他主张把这几个宗教混合起来創建一种新宗教，也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把全人类統一起来。

他在前六卷里着重闡述了前五点，从前五点归結到了第六点，同时他利用第六点为后四卷开辟了一条道路。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后四卷是从第六点“結論”开始的，这也就是他的后四卷的主要調子。

湯因比的前六卷采取了一种綜合論述的方法，研究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四个問題；到了后四卷他改而采取专题論述的办法，分別討論了統一国家、統一教会、英雄时代、文明的空間

关系、文明的时间关系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四卷乃是前六卷的补充与引伸，使他更便于根据他在前六卷中所提供的历史材料与论据做出充分发挥，得出他所预定的结论。汤因比自称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他的结论是根据科学历史材料取得的。但是甚至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也看出来他的这个说法是骗人的。因为他的结论是早已设想好了的，他只不过是选择、罗列甚至编造一些材料来为他的预定结论找根据而已。

根据汤因比的说法，所谓统一国家就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大帝国的统一局面，如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和欧洲古代的罗马帝国等等。汤因比认为人们一般都欢迎统一国家的建立，因为它提供了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使人们相信统一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但是统一国家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幻想。统一国家是一种手段，是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前奏。统一国家之所以成为一种手段是因为它的大统一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可沟通性”，不但使各族各地人们在地理上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往，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中的各阶级之间加强了沟通的机会。尤其是统一国家所提供的各种组织制度，如交通、卫戍站和殖民地、行省制、首都、官方语言和文字、法律、历法、度量衡、货币、常备军、文官制度、公民权等等，都为这种沟通性创造了物质条件。

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统一教会。统一国家是为了统一教会的出现做准备的。统一教会是什么呢？是毒瘤吗？有人认为教会是毒瘤，因为它是在“统一国家的腐烂了的社会体上生长出来的”。但是汤因比却驳斥了这种说法，因为“宗教不但不会在它的信徒心中摧毁社会责任感，反而只会增

加他們的責任感”。是文明藉以誕生的蛹體嗎？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湯因比自己承認他在前六卷和后四卷里曾經有所改變。他在前六卷里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企圖論證教會乃是新的文明藉以誕生的蛹體，但是在后四卷里他却把主要篇幅用在論證教會是一種更高一級的社会新品种了，文明只不过是教會的序曲。

湯因比稱這種論斷是一種新的分類法，因為他在過去一直是以文明做為歷史研究的“單位”的，而現在他却認為“在今天已可望見的世界大統一的局面里”，將出現一個更高一級的新品種的社会，那就是現存的幾個高級宗教大混合的統一教會。這是現存的各個高級宗教的責任，也是所有的宗教信徒的責任。他認為宗教和科學各自有自己的主管範圍：宗教管感情，科學管理智，凡是科學與宗教發生矛盾的所在，宗教應該讓步。在他看來對於人类的感情、潛意識、心靈活動等問題，科學是无能為力的。而這些方面乃是人類事務中的關鍵部分。這就為他的統一教會找到了社会存在的理論基礎。

湯因比關於“英雄時代”的說法是頗為离奇的。他說“英雄時代”是“一道社会的拦洪坝”，是“一條軍事界限”，或“一條軍事前綫結晶化以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自然結果”。根據他為“英雄時代”所下的定義，他所說的这个时代似是時間上的概念，又似是空間上的概念，又似是心理上的概念。他說別人（Hesiod）把时代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黃銅時代和黑鐵時代的划分是個“离奇的設想”，其實他自己的這種說法，除了离奇還有混亂。

究其原意无非是說在人类的历史过程里，有那么一種时代，統一国家衰微了，边境以外的蛮族（或軍事集团）侵入了边境，造成了軍事冲突連綿不断的时期。其結果，統一国家灭亡，胜利的蛮族不

可避免地因为他們所取得的胜利而招致毁灭，在一片混乱之后还会出现一个“黑暗时代”，形成了历史上的間歇时期。湯因比称这种时代为悲剧，留下来的只有英雄的事迹和史詩的題材。

在这个題目下面还有两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湯因比认为妇女的乖戾行为乃是造成英雄时代悲剧的主要原因，他把一切道义上的責任都推到了妇女的身上。另一点就是他认为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扩张与殖民主义掠夺都是由边境外的蛮族引起的，殖民主义者只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就这样，他就混淆了侵略与被侵略、古代史与现代史的界綫，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张目。

接着的两个部分他分別論述了不同文明在空間与時間上发生接触的問題。在空間的接触方面他談到了现代西方文明和俄罗斯与苏联、印度、伊斯兰世界、犹太人、远东文明等等所发生的接触情况。在時間的接触方面，他談到了历史上的一系列所謂“复兴”现象，如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复兴，法律体系的复兴，哲学的复兴，語言、文学与造型艺术的复兴，宗教思想与組織机构的复兴等等。他在这里談到的問題和使用的材料倒是不少，可是这位历史学家恰是缺少历史发展的眼光，而把这些“复兴”都看成是历史的重演。

最后三部(十一、十二、十三)乃是全书的結論部分。第十一部分原来的标题叫做“文明历史的节奏”，而现在却改成为“历史的法則与自由”了。这一改变看来好象变动不大，但是却表现了他的一种决心，表示湯因比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部分里的中心思想是人类社会的法則与非人类世界(自然界)的法則不同。对于非人类世界的法則人类可以認識它們但是不能改变它們。人类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控制与利用这些法則，但是这只是限于物质的自然界。至于人类社会却是另一回事，人类社会的“法則与自

由”不但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更重要地取决于人与神的关系。

第十二部分谈“西方文明的前景”问题是汤因比写作这部“大书”的创作目的的又一次总暴露。他在这里感慨系之地谈到了许多问题。从有史以来的二十一个文明只剩下一个文明开始,他再一次提出了是否这一个文明也要解体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不会解体,他们西方基督教文明可以与他自己所研究分析的其他二十个文明不同。接着他大量地议论了今天世界上的各种问题,从他的这位历史学者的角度上畅论了今天的世界时事。他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美苏关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联合国问题、核弹问题等等。在他的这许多议论当中充分暴露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他极力为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为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虚伪面貌和两面手法打掩护。他主张用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统一全世界,主张美苏合作,主张阶级调和,主张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屈服。他不但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找历史根据,而且还大量使用了和平主义、福利主义、人道主义与核讹诈的语言。他的后四卷写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四卷中这些新的内容,也是时代的一种反映,是汤因比的现代帝国主义代言人的面貌的比较彻底的暴露,在今天西方世界里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但是虽然如此,汤因比也还是忧心忡忡地说人类社会是否就会“从此快乐幸福地永远生活下去”呢?还是不可能,因为人从上帝那里招致来的“原罪”是生而俱来的,要过“快乐生活”,还得靠上帝。

第十三部分“结论”只谈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写作这部“历史研究”的过程、目的与动机。他在这一部分里企图为上一部分总暴

露打掩护，迷惑人，又摆出了一副“正经的学者面貌”。仿佛这是一部完全从研究问题的观点出发的学术性著作。湯因比在这一部分里又一次重复了他已经说过许多遍的故事。他说他受的是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教育，他是偶然地生入了这样一个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世界，他写这样一部书完全是偶然的。

湯因比的这部“历史研究”乃是正在没落的资本主义世界服务的，他们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力图散布迷人的言语，欺骗那些太老实的人们，尤其是企图用学者的面貌与口吻吸引那些没有阶级分析能力的知识分子，以图达到“挽救”资本主义世界命运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认识湯因比的虚伪面貌，我现在引用一个材料。在后四卷出版以后，湯因比曾写过好几篇短文发表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为他自己的著作进行吹嘘宣传，其中有一篇刊载于1955年“国际事务”第31卷（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1, 1955, pp. 1-4），题名叫“历史研究：我想干什么”。现在我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引用几段：

“……对于世界规模的当代事务写一本概况的书，只能从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上去着笔，而研究世界历史，如果作者不想到他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那也是写不出力量来的，因为一个人只能从他自己的同代人那里获得生命。……”

我所出生的时代正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面貌已经变得有些不复可以辨认，而在这个世界上，西方世界经历了最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在这四十年的历史新篇章自行展现的过程当中，东方学者和考古学者还为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其他早已被完全遗忘或仅存支离破碎的残片的历史篇章。……再加上

我們自己这一个时代的大量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发生都給了我們极为丰富的新的历史知識。自从已知的最早文明在五千年前出现以来，我們对于人类历史的視野已經极为广闊地扩大了，而且深度也加强了；好奇心既然是人性的一个特征，我們这一代就变成不能不对历史的整个面貌采取一种新的看法。这就是我的这部‘历史研究’的来历。……

“到十七世紀末为止，西方的传统的（历史）样式一直是以色列式的，这种样式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拿来以后曾根据它們自己的爱憎加以修改。根据这一种犹太人、基督教、穆斯林的看法，历史乃是上帝的一种行为，从‘創世’开始，注定要到‘最后审判’为止……最后一个主张这种……样式的伟大的西方人乃是博胥埃主教（Bishop Bossuet）。他的十八世紀继承人創造了近代西方晚期的历史样式，我們一直为了这个样式工作。他們把上帝的形象从这个样式中挖掉了，他們对待教会的办法就和教会对待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办法一样……从教会的身上褫下了‘选民’的資格……；他們把这种資格的一部分送給了‘欧洲’，但是其主要的部分却送給了那一位历史学家所属的西欧的某一个国家：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完全看他是哪一国人。……在那一种已經过时的近代西方晚期的样式里，根本沒有中国或印度的地位，对于俄国和美洲也是如此。……我們將再一次……用新的眼光来看历史。

“迄今为止人們所知道的全部文明的历史还无法沿着一根綫索排列下来，一直引伸到现存的任何一个文明或民族的身上。看来历史的样式不象是一根豆藤，而象是一棵大树，文明的发展很象是許多枝桠同时生长；而这个样式的最重要的証据便是近代史的发展形象。我們的西方文明在这个时代里和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文明都发生了接触。……这种比較的方法也可以扩大到历史的全部；而这样做在事实上也正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們是有关知識的理論、心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經济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对它們的材料进行比較研究以便发现事实与事件的結構真相。……

“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第一件应该做的事乃是探索在这一片领域中，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使用探索‘法则’、规律、同一性、再现性的科学方法。博胥埃以后的某些西方历史学者根本否认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什么规律性……但是……样式是一直存在的。……一个人在心里没有样式就无法思想——我的看法是没有样式就不能思想——那样最好还是认识这些样式的模样；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自觉地认识他的样式，他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

“我写这部‘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想对于人类事务进行科学的研究，……问题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这些……样式，而在于这些样式究竟包括了人类的全部事务呢，还是仅仅包括一个局部：个人的看法是在人类的事务中有一些是没有样式的，因为它们并不受科学法则的约束。……我还认为从人类的灵魂的下意识深处涌现出来的诗歌和先知似的预感是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的。我认为在事实上，我们正是在这里面对着真正的创造行为，正是在这些行为当中诞生了新的事务；这样就引使我们重新回到了西方社会从四世纪到十七世纪末所接受过的那种圣经式的历史观。

“在我一面行进的过程中，宗教再一次占据了我这一幅宇宙图画的中心位置。但是我并没有回到我在受教育时期所持有的那种宗教观。我所受的教育认为基督教乃是全部真理的唯一表现。我现在却逐渐相信所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和哲学都是从某一个或其他角度上对于真理的局部表现。……一种印度教的观点正是我这部著作的后四卷在写作时期的一个主要论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走向打开宇宙之谜的最容易的道路无疑是通过他自己的祖先所信仰过的宗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必须排斥其他宗教所提供的其他通路。”

湯因比在这里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他写“历史研究”的动机；二、他所认识的历史“样式”；三、他的研究方法和世界观。这几

个問題的确是我們在研究与批判湯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值得注意的几个問題。

关于湯因比的有些問題，我在这个譯本的上册与中册代序里已經談到过一些。现在我再結合后四卷的主要内容，針對这几个問題，对湯因比进行一些分析与批判。

三

第一个是他的写作“历史研究”的动机問題。

关于这个問題他总是不嫌煩絮地到处說的。他一般的說法大概有这么几条：他受的是希腊羅馬式的古典教育；他学历史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碰巧生在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重新发现了許多已被人們遺忘了的文明遺址和遺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世界已經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整体；他对于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人类所固有的好奇心；他要对于人类事务的全部进行新的綜合性的研究，等等。根据他的这些說法，他的写作“历史研究”的动机好象是純粹为了滿足他个人的兴趣似的。这个兴趣不但是个人的，而且还是学术性的，没有什么政治原因，完全是“无害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湯因比是不是真的这样“天真无邪”呢？如果相信了他的这些话，那却真的是未免太“天真”了。

首先，湯因比所“碰巧”生于其中的世界并不是什么仅仅发生过两次大战的世界。他虽然也說过这个时代是个“革命的”时代，但是他所說的“革命”是和我們所說的不同的，他使用“革命”这个字眼只是用來說明現象上的“改变”，而沒有包括什么階級內容。湯因比生于1889年，到今天还活着。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陣营分崩离

析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形势，做为英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的湯因比，不能不从他的阶级本能出发，对于他的本阶级的前途与命运发出绝望的呼吁，进行绝望的挣扎，为延长他的本阶级的历史命运献计献策。因此，他做为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就从这个角度对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进行“研究”了。这个“研究”完全是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的。他一方面企图通过他的“研究”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对抗，另一方面还企图用他的那一套伪科学的分析（在这一点，湯因比还使用了神学的手段），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欺騙全世界人民。

湯因比的这个意图其实是很明显的。他的第十二部分就是专门谈论西方文明的前景的，在他的其他部份里，凡是出现这种机会他就绝不放过，他总是联系到今天世界的形势、人类的命运，尤其是他所属的那个所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命运，而事实上却是西方大资产阶级的命运，帝国主义的命运。湯因比写作这部“历史研究”正是在他看到了斯般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7年出版了他那本“西方的没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以后，有所感而发的。他对于斯般格勒的悲观主义的论断不满意才写作这一部“大著”，因此他的写作动机是明显地为了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找出路，替它打强心针。他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而是紧密地为了他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只是，他不肯明说与承认这一点而已。

其次，他还企图通过“历史研究”根据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结

全人类的历史經驗，为他們的統治地位寻找历史上的和理論上的根据。湯因比认为在全世界迄今出现过的二十一个文明里，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还有生命力，其他二十个都或是已經解体死亡了，或是正在解体与死亡过程当中。根据对这二十个文明的考察，湯因比认为可以得出一个結論，这就是解体与死亡并不是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这个西方基督教文明如果接受其他二十个文明的教訓就可以避免解体与死亡的命运。他罗列大量的历史材料，讲了許多道理都不过是为了說明他的这一套理論。

湯因比认为近代与现代的历史学者們有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偏向，那就是只注意研究历史中的个别人物与事件，而不注意研究历史的整体。他认为这样枝枝节节地研究历史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无法总结人类历史的經驗。他說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与进行局部的研究乃是“一架天秤的两端”，而 he 自己是属于全面研究这一端的。他还自称他的研究方法是綜合的研究方法。湯因比不但以研究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做为标榜，而且还以綜合研究进行标榜，这就是从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学艺术的各方面，也就是从全文化的方面进行研究。有时候湯因比甚至还不以此为滿足，他还把他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社会历史以外去，例如他还談到整个生物界、整个非生物界和全宇宙的事。这也就是他所說的对于历史进行嶄新的研究。湯因比正是摆出了这样一个陣势来总结人类历史經驗的。

但是对于一个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來說，他的这种总结却是完全沒有用处的，因为他完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例如，他根据什么理由把古代希腊与羅馬社会的历史现象和今天的資本主义社会相比呢？它們的經濟制度完全不同，它們的階級組成情